

东晋士族的君主观念

于瑞琦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文博学院, 重庆 400047)

摘要: 西晋末年, 司马氏与南北士族联合, 在南方建立了东晋政权, 门阀士族掌控实际的君主权力。士族阶层也形成了复合型君主观念, 在保持和打压司马氏象征性君主的同时, 也纷纷凭实力角逐于变化着的实际性君主。复合型君主观念促进东晋政权的正常运作, 又深深影响着它的发展, 使东晋政权烙上了明显的士族印迹。

关键词: 东晋; 士族; 君主观念

中图分类号: K23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970(2008)03-0099-04

收稿日期: 2008-03-04

作者简介: 于瑞琦(1982-)男, 河南长垣人, 重庆师范大学文博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古代社会思想史研究。

(一)

公元 291 年, 西晋司马氏内部为争夺中央权力爆发了“八王之乱”, 给中原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北方游牧民族乘势南下, 攻破首都, 先后俘获晋怀帝、愍帝, 司马氏皇族遭受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永嘉之乱后, 西晋名存实亡, 北方人口大量向南迁徙。“洛京倾覆, 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1](卷六十五, P746)}河北范阳祖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 以所乘车马载同老疾, 躬自徒步, 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居丹徒之京口。”^{[1](卷六十二, P694)}士族徐邈“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 南渡江, 家于京口。”^{[1](卷九十一, P2356)}南迁的众多北方士族聚集在淮水以南和长江下游一带, 围绕着建康(现南京), 移植来了北方士族拥兵聚众的一股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在广大的北方士族阶层中, 琅玕王氏等高门大族为翘楚, 其他士族惟其马首是瞻。士族温峤见过王导, 就喟然叹曰:“江左自有管夷吾, 此复何忧!”^[2]而王敦“尚武帝襄城公主”, ^{[1](卷九十八, P2553)}东海越王秉政西晋时, 既为扬州刺史, 在江南经营多年。随着司马睿移镇建邺(即建康), 王导从弟王舒“因与诸父兄俱渡江委质焉”。^{[1](卷七十六, P1999)}琅玕王氏兄弟皆南迁过江到建康, 强大的政治、军事、家族势力, 使琅玕王氏的王导、王敦兄弟成为北方士族阶层的核心人物, 是北方士族各支政治力量的代表。

北方士族大量南迁的同时, 司马氏皇族成员也来到了江南。“八王之乱”时, 司马氏皇族自相残杀;“永嘉之乱”时, 皇族成员又成为外族屠戮的首要目标, 直系皇室成员全部罹难, 旁支琅玕王司马睿“依王导计,

始镇建邺”, ^{[1](卷六, P144)}远离北方才得以全身于江南。汝南王祐“永嘉中, 以寇贼充斥, 遂南渡江, 元帝命为军咨祭酒。”^{[1](卷五十九, P1593)}虽然司马睿当时还只是安东将军, 但是汝南王祐、西阳王琇、南顿王宗、彭城王雄皆入司马睿手下任职, 共同支持司马氏皇族这个势力最强者。可是避乱江左的司马氏皇族已今非昔比, 人力单薄, 名望还远远不如一些北方高门名士。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身份镇守建康时, “吴人不附, 居月余, 士庶莫有至者”。^{[1](卷六十五, P745)}而且皇室财力匮乏, 以致闹出笑谈:“有能臧季龙者, 赏绢三千匹, 金五十斤, 封县侯, 食邑三千户。”^{[1](卷六, P148)}而对于祖逖北伐, “给千人廩, 布三千匹, 不给铠仗, 使自招募。”^{[1](卷六十二, P695)}

随着西晋怀帝、愍帝相继被俘, 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 北方已成为他们长期厮杀的战场。迁徙南方的众多士族人物和百姓, 希望在南方建立一个稳定的统治政权, 保护不同阶层的既得利益, 维护生产和生活秩序。谯国士族桓彝初过江就说:“我以中州多故, 来此欲求全活, 而寡弱如此, 将何以济!”^{[1](卷六十五, P747)}永嘉时期, 顾荣就对陈敏献策:“中国丧乱, 胡夷内侮, 观太傅今日不能复振华夏, 百姓无复遗种……将军怀神武之略, 有孙吴之能……大事可图也。”^{[1](卷六十八, P1812)}南方吴姓士族在看到西晋政权无以为继之时, 也试图建立一个由他们支持的孙吴一样的稳定政权, 以保障他们在江南的长久利益。而司马氏皇族同样需要名正言顺地延续自己在江南之地的统治。愍帝传诏于时有丞相头衔的司马睿:“卿指诣丞相, 具宣朕意, 使摄万机, 时据旧都, 修复陵庙, 以雪大耻。”^{[1](卷六, P145)}晋室已经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司马睿

身上,希望他继承晋祚,保全司马氏在江南的统治,以图恢复旧的统治秩序。

随着北方士族的大量南迁,政治中心也由北方的洛阳转移至南方的建康,作为当时力量最为强大的北方士族的首领王导、王敦,成为东晋新政权建立的积极推动者。王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司马睿),潜有兴复之志”。^{[1](卷六, P1745)}司马睿也听从王导的建议,“用王导计,始镇建邺(建康)”。王导对永嘉之乱后晋室名存实亡的政治现状,以及整个社会的动荡局势洞若观火,就建议司马睿到江南保存实力,并收拢渡江的北方士族,“与之图事”。王导个人卓越的政治远见,使得他从个人意识上认识到拥护司马氏,联合南方士族,建立新政权的必要性,所以倾心支持在江南的司马氏首领人物司马睿。为门户计,王导对北方士族的实力派人物——扬州刺史,其从兄王敦说:“琅玕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1](卷六, P1745)}这也是从观念上意识到,北方士族虽然掌握一定的实力,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局势下,还必须以支持司马氏君主的方式,在江南建立新的晋政权,才能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并进一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作为北方士族的首领,琅玕王氏王导、王敦兄弟在门户内取得共识,积极推动东晋的建立,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不仅他们的个人意识和政治理想发挥了巨大作用,更主要的是他们拥有发言的实力。谯国士族桓彝刚渡江避乱,看到江南的情形并不能为他提供一个安全的保障,忧心忡忡,但是和王导一番交谈之后,就对别人说:“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1](卷六十五, P1747)}南迁的北方士族常常相邀宴饮,面对山河异色,相视流涕,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止做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1](卷六十五, P1747)}王导凭借个人卓越的政治素养和非凡的政治魅力,稳定了北方士族的情绪,凝聚了已经处于分崩离析、但求自保的北方各股政治势力,为东晋的建立提供了先决条件。王敦在东海越王秉政时,就为扬州刺史,经营江南多年,手握重兵,讨华轶、诛杜弢,东征西讨,为东晋新政权的建立提供军事上的保障。王导、王敦为了提高司马睿的声望,打下以后成为君主的基础,经过密谋,在上巳节,让司马睿盛装出行,“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1](卷六, P1745)}吴姓士族的巨擘纪瞻、顾荣见状,“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1](卷六, P1746)}王氏兄弟凭借自身的声望,使得司马睿得到了吴姓士族的支持。

对于南方士族,王导对司马睿说:“顾荣、贺循、纪瞻、周玕,皆南士之秀,愿尽优礼,则天下安矣。”^{[1](卷六, P1746)}司马睿对此言听计从。对于北方士族的团结拉拢,南方士族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毫无定处,九鼎迁洛

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2](言语二, P19)}这是司马睿代表南迁的北方士族探问南方士族对未来新政权的态度,而顾荣的回答明确地表达了吴姓士族对司马睿在江南建立新的中央政权的支持。南方士族的支持,为东晋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

最终于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即晋王位,次年称帝,即晋元帝。在元帝登基前后,王导就拜为右将军、扬州刺史、监江南诸军事、骠骑将军、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中书监、录尚书事、假节、开府仪同三司,身兼数职,在中央权力核心层占据首要位置。故而,“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2](宠礼二十二, P388)}王敦则任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牧,手握重兵,坐镇武昌,扼据长江上流。琅玕王氏王导、王敦兄弟,一中一外,遥相呼应,把持了东晋政权的朝政,时人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王与马,共天下”这既是东晋政权建立的实际存在状态,也确定了南方各权力阶层对显权的认知方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东晋士族阶层与以往不同的君主观念。

(二)

在南北士族支持下建立的东晋中,其权力存在决定了这些强权势力代表的君主认同方式和对君权的服从程度。因此,在“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中,王氏势力与君权一样,拥有支配政权、分享统治成果的权力。王导经常根据自己的好恶任命官员,他对太原士族王述说:“名士之子不患无禄,屈临小县,甚不宜耳。”^{[1](卷七十五, P1963)}不顾南方士族的反对,王导肆意任用才能不堪其职的赵胤为护军将军。而王敦,“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1](卷九十八, P2560)}不仅安置众多王氏子弟在地方掌握实权,且“自加兖州刺史郗鉴为安北将军”,^{[1](卷六, P156)}拉拢外姓的实力派人物。在“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之下,王氏已成为君权的构成部分,王氏代表也属于君主的一部分。

东晋“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3](P173)}在士族阶层的政治意识里,王氏等世家大族与司马氏一起构成君权,因而充分享受君权下的成果也是必然的。汝南士族周嵩对司马睿说:“虽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之际,割据江东,奄有南极,龙飞海隅,兴复旧物,此亦群才之明,岂独陛下之力也。”^{[1](卷六十一, P1661)}

在这样的君主观念下,东晋政权的决策权完全掌握在王氏等门阀士族手中,“祭则司马,政在士族”。^{[4](P6)}颍川庾氏专权时,在北伐这样关系举国上下的重大决策上,庾翼“欲率众北伐……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不从,遂违诏辄行”。^{[1](卷七十三, P1933)}桓温擅权时,简文帝“虽处尊位,拱默而已”。^{[5](卷一百三, P253)}司马氏君主丧失了

君主在国家政权中的决策权,只能听从门阀士族的安排,在程序上例行公事而已。明帝欲令太原士族王允之入朝为官,王允之的父亲王述却拒绝说:“臣子尚少,不乐早官。”^{»[1](卷七十六 P2002)}在官员的任命上,司马氏君主的用人权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士族可以随意根据自己的意愿像君主一样进行选择。司马睿面对王氏的擅权,想利用刘隗、刁协来分其权,以加强君权,可是王敦立刻以“清君侧”之名兵向建康。“敦前锋攻石头,周札开城门应之。”^{»[1](卷六, P155)}而安东将军、梁州刺史甘卓在王敦与司马睿之间反反复复,最后站在司马睿一方,“军次猪口,累旬不前”,^{»[1](卷七十, P1865)}观望局势的发展,最后以退兵了事。在“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下,司马氏君主毫无实际统治权,军政大权都牢牢掌握在士族阶层手中,士族完全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玩弄权术,置君主于不顾。

“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几乎与东晋王朝相始终。在这个复合模式中,“马”——司马氏处于象征和旗帜位置,是不变的,“王”是士族势力在政权中的表达,但能否代表东晋政权中的士族阶层,要视其个体势力大小而异,因此它是随着士族实力升降而变更着。其间的门户更迭,也使得高门士族轮流享受君权。继琅玕王氏之后,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北方高门大族,轮流登台唱戏,主宰东晋的一系列重要决策、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方针政策,代替“王与马,共天下”中的“王”,使得司马氏君主完全成为象征性的君主和法理上的君主。“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1](卷一七 P2980)}

没有实际军政大权的东晋君主已经沦为士族谋取权力、谋求士族阶层内部权力平衡的政治象征。“元帝欲舍明帝立简文……丞相(王导)披拨传诏,径至御床前,曰:‘不审陛下何以见臣?’帝默然无言,乃探怀中黄纸诏裂掷之。由此皇储始定。”^{»[2](方正五, P172)}王导在君主立储问题的坚决,保证了自己未来在权力核心层的中心地位。王敦身死事败后,王导失去了军事上的外援,“(明)帝崩,成帝即位,群臣进玺,司徒王导以疾不至……而私送车骑将军郗鉴。”^{»[1](卷七十, P1870)}在王导看来,参加没有权力的新皇帝的登基大典,远没有拉拢手握重兵的郗鉴重要。“庾冰自以为兄弟秉权日久,恐易世之后,亲属愈疏,为他人所间,每说帝以国有强敌,宜立长君;请以母弟琅邪王岳为嗣。”^{»[1](卷九十七 P3048)}琅邪王岳是庾冰的外甥,若以其为嗣,庾氏还可以继续借助君主达到自家大权长期不旁落。简文帝让门阀士族桓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太原士族王坦之为了防止桓温进一步坐大,平衡士族阶层内部的权力,“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帝乃使坦之改诏焉。”^{»[1](卷七十五 P1966)}

所以,在东晋政权中,“王”呈现出轮流性和阶段性,门阀士族轮流享受君权,士族阶层随着实力的增长,君主意识也日益强烈,与司马氏平分权力是东晋士族实力增长过程中的基本政治意愿。

王敦再次起兵时,“(钱)凤等问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称天子!便尽卿兵势,保护东海王及裴妃而已。’”^{»[1](卷九十八, P2563)}王敦在观念上并没有彻底颠覆司马氏的意图,只是谋求另立司马氏君主,防止庾氏利用外戚身份对王氏权力的蚕食,继续保持“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颍川庾氏在政治实力上升过程中,庾冰“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夙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贤相。”^{»[1](卷七十三 P1928)}庾翼“每竭志能,劳谦匪懈,戎政严明,经略深远,数年之中,公私充实,人情翕然,称其才干。”^{»[1](卷七十三 P1932)}当琅玕王氏衰落时,庾氏就马上代替“王与马,共天下”中“王”的位置。庾翼在荆州举行公务会议时,问诸僚佐曰:“我欲为汉高、魏武,何如?”^{»[2](规箴十, P312)}当有政治力量威胁到庾氏的权力时,庾氏也是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即使是与庾氏家族有姻亲关系的司马氏。“会南顿王宗复谋废执政,(庾)亮杀宗而废宗兄蒙。”^{»[1](卷七十三 P1918)}

谯国桓温以武功崛起,权倾朝野,拥兵擅权与王敦无二,桓氏已经取代了庾氏,但他还继续通过北伐收复中原加强自身的权威,北伐失败后就选择了废立君主的方式。“(桓温)因图废立,诬帝在藩国有痿疾,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参侍内寝,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长欲封树,时人惑之。”^{»[1](卷八 P214)}桓温就这样以诬蔑君主的方式,废海西公立简文帝,得“殊礼,位在诸侯王上”,^{»[1](卷一百一, P3212)}实现了自身政治理想的第一步。即便如此,桓温仍不满足,“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2](沈潜三十三, P483)}此时,桓温的权力已经达到了东晋门阀士族的顶峰,其君主意识也超过了以往任何门阀士族的代表人物,与司马氏君主平分君权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政治意愿,“望简文帝临终禅位于己”,改变“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成为桓温新的政治意愿。但最终由于士族阶层内部的反对,桓温郁郁而终。

随着士族阶层门户间实力的此消彼长,士族人物可以通过不断地对权力的攫取,壮大门户,最终达到“王与马,共天下”中“王”的位置,处于士族阶层的最顶端,与司马氏君主平分权力。在东晋建立之初就形成的门阀士族和君主共同构成的君权,并凭借实力实际地运作君权的君主观念,驱使各个有实力的士族投身于复杂多变的东晋政治斗争中,试图取代“王与马,共天下”中王的位置,又使得东晋政权呈现出阶段性特点。

琅玕王氏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居功至伟,王导、王敦奠定“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与司马睿共同构

成君权,王氏一家独大,其他士族根本无力与其相抗衡。明帝时,王敦死后,颍川庾氏凭借外戚身份进入权力核心层,王氏失去军事的外援,与庾氏在政权的争夺上处于相持阶段。庾氏借平定苏峻叛乱壮大了实力,正式代替了王氏,“与马共天下”。桓温在庾氏家族后继无人、慢慢丧失地方的军政大权的时候,依托荆州,平定成汉,建立武功,逐步取得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控制权,取代庾氏,“与马共天下”。桓温之后,掌握北府兵的陈郡谢氏逐渐强大,与桓氏的其他势力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争夺。关系东晋生死存亡的淝水之战的胜利,把谢安推到了个人权力的顶峰,也成就了东晋最后一个门阀士族。东晋政权就是这样在士族间不断地变换门阀士族的过程中运行的,也就是各个士族通过自身的实力的不断提高,受整个士族阶层君主观念的影响,并随着个人政治地位的上升,个人君主意识相应加强,开始挑战“王与马,共天下”中的“王”,并取而代之。

在东晋士族阶层内部,许多人都有取代“王”的实力和野心。在东晋政权中,士族心目中的“马”仅仅是君主的象征,也仅仅是晋之所以为晋的根本原因所在,而君主的实际存在掌控在士族权势手中,只要不彻底倾覆“马”这个法理上的君主引起整个士族阶层的反对。“王”也是一个符号象征,君主的实际存在就可以在士族阶层内部进行变换,崛起的士族就可以挑战旧有的君主实际存在,取而代之,且不受政治道德伦理的制约。所以,从琅玕王氏开始,东晋政权中挑战王氏、消灭异己的政治斗争就没有停止过。

(三)

东晋初年所形成的统治政权模式决定了这个时期的人们对君主的认知方式和观念意识。从君主阶层到士族阶层都以自己的方式强化“王与马,共天下”的君主意识,并采取不同的方式维持这样的存在。拥有君主名分的司马氏并不甘心自己仅仅是充当政治傀儡和象征,他们不断地采取各种方式,为君主实际存在的那部分争夺更多更大的生存空间,强化在东晋政权中君主名分的实际意义。

首先就是利用士族阶层间的矛盾,突出君主在政权中的重要性。

北方士族刁协“性刚悍,与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为王氏所疾”。^[1](卷六十九, P1842)]北方士族刘隗劾奏王氏王含,“文致甚苦,事虽被寝,王氏深忌疾之”。^[1](卷六十九, P1836)]元帝司马睿就任用刁协为尚书令、刘隗为侍中,牵制、分化王氏的权力。对于北方士族把持朝政,吴姓士族周玘“自以为不得调,内怀怨望……阴谋诛诸执政……与诸南士共奉帝以经纬世事”。^[1](卷五十八, P1573)]对于周玘的举动,元帝“闻而秘之”,^[1](卷五十八, P1573)]只是调动了他的职位。陈郡谢氏和

谯国桓氏处于政治上的争夺状态时,孝武帝乘机让宗室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司马氏成员第一次进入东晋的君主实际权力空间。

其次是不断地更换“王与马,共天下”中“王”的身份。王敦死后,司马氏君主就开始扶持、倚重外戚颍川庾氏,庾亮担任中书令,“太后临朝,政事一决于亮”。^[1](卷七十三, P1918)]同时分解王导的权力,录尚书事增设陆晔、荀崧二人,“王导录其一,荀崧、陆晔各录六条事”,^[1](卷三十九, P1234)]荀陆二人实际上架空了王导的总录地位。经过苏峻叛乱,庾氏掌握了更多的军政实权,彻底取代了王氏,司马氏君主也顺利完成了“王与马,共天下”中“王”的转换,由王氏转为庾氏。同样,孝武帝在淝水之战前,委任温和的谢安为丞相,疏远曾经给司马氏皇族带来奇耻大辱的桓氏,以谢氏掌握的北府兵为主力,抗击北方的入侵,最终无可争议地完成了“王”的身份的交替。

第三就是防止司马氏失去名分。王敦以“清君侧”之名兵向建康,元帝就遣使对王敦说:“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1](卷六, P155-156)]司马睿以退为进,主动选择退位,让王敦重新选择新的司马氏代言人,这样东晋政权君主的名分还是司马氏的。简文帝在桓温面前受尽凌辱,“常惧废黜”,但是“遗诏家国事一禀之于公(桓温)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1](卷九十八, P2579)]破灭了桓温试图通过禅位的方式获取君主名分的政治意愿。

东晋末期,随着庶族的兴起,“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被彻底打破,士族阶层复合型的君主观念被庶族所摒弃,司马氏象征性君主和士族阶层实际性君主模式,也随东晋政权一起走向毁灭。

总而言之,东晋政权建立的方式也就是这种君主观念建立的过程,一旦这种君主观念形成,又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人们的政治军事生活,使得东晋政权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君主被分为名义性的和实在性的两种,名义上的君主一直受士族阶层的欺压,无力收回失去的实际权力;而居于主导地位的门阀士族受政治伦理道德的约束又不能完全抛弃君主,把实在性的君主和象征性的君主统一起来,政权就随着士族门户的更迭而轮流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士族和君主在政权中的权力也有阶段性地变迁。

参考文献:

- [1]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 徐震堦.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3] 王树民.廿二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4]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5]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6]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辑 伍纯初]